

属下阶级 (subaltern) 女性参与革命的两个叙事*

: 金末峰《亡命女》与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比较考察

金英明** · 朴宰雨***

—

韩国与中国的20世纪前半期的文学史具有相当的同步性。韩国与中国在封建社会末期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 渐渐进入殖民半殖民之路, 韩中人民就受到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 也在水深火热中摸索出路, 两国文学作品中就反映这样的历史和社会情况, 这就是两国文学同步性的主要背景。中国学界经过新时期的长期努力, 在文学研究方法上已经发展到全方位的突破, 不过, 还有不少作品需要引进更确切的新锐的文学理论来重新解释。其中, 也有些作品一定通过比较文学的广阔视野才能完整地理解。韩国文学学界也是一样, 虽然和中国有所不同, 没有受到反帝反封建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的洗礼, 早就引进各种各样的海外理论与本土性理论来进行解释, 但是对某些文学史现象与作品, 还不够用最恰当的分析方法论来研究。有些作品, 当然还需要通过比较文学的视野重新解释。

本论文认为韩国金末峰的《亡命女》和中国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 前者是在日本殖民统治语境下写作的, 后者是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情况下在解

* 이 논문은 2010년도 한국외국어대학교 대학원 중문과 BK21연구비 지원으로 연구되었음.

** 한국외국어대학교 대학원 중문과 연구생 ymkim518@yahoo.co.kr

*** 한국외국어대학교 중국학부 교수 pjw9006@hanmail.net

放区延安空间创作的，思想与言论表现条件根本有差，而且从作家与作品在本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来看，也不太能相称¹⁾，不过，从上面的角度来看，两篇作品是有重新比较探讨余地的很好的作品。

无论采取什么样的观点，1919年的“3·1”运动和1919年的“5·4”运动无疑是韩中两国文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分别给韩国和中国的文坛带来了阶段性的新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在韩国经过全民的“3·1”抵抗运动，把之前蛮横的武断统治改变为文化政策，但是殖民统治的本质并没有改变。韩国作家们纷纷把郁闷和愤怒之情反映在杂志或报纸上，以此来唤醒全民族的抗日意识。不过，从韩国文学的发展趋势来看，1920年代初期是韩国文坛在启蒙的基础上浪漫与颓废风靡的时代。到了1920年代中期慢慢接受普罗文学思潮，因此从这个时期到1930年代初期卡普解散为止的约10年期间是普罗文学主导韩国文坛的时代。金末峰的《亡命女》是1932年发表在《中央日报》新春文艺上的登坛之作。因此，金末峰的后期之作虽然大都是大众文学，和普罗文学保持了距离，但写《亡命女》时期的韩国文坛依然处于普罗文学的辐射圈中。无论如何，《亡命女》是金末峰作品中受到普罗文学影响的最重要的一篇。

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49)三个十年时期中，第二个十年(1927-1937)时期是左翼革命文学期，是1930年成立的与韩国卡普相似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主导中国文坛的时期。丁玲是“左联”著名的作家，曾经受到了鲁迅、茅盾等作家的高度评价。²⁾1931年9·18事变爆发以后，东北地区沦陷为日本的殖民地统治。1937年7·7事变爆发以后，中国进入了全面的抗日战争时期。文学也从“5·4”以来的“启蒙”主题转向了焕发民族巨大凝聚力的“救亡”主题。丁玲在抗战时期的解放区延安1940年就写了《我在霞村的时候》(以下简称《霞村》)，1941年6月把它登载于《中国文化》第二卷第一期。

1) 金末峰后来走大众文学之路，虽然得到“韩国现代大众文学的开创人物”之评，但是韩国现代文学史总是不太重视这个作家与这篇作品。不过，丁玲是在三十四年代的中国文坛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家，而这篇作品也是论争不休的问题作品。

2) 周靖波，〈论延安时期丁玲的创作及转变〉，再引于《中国现代文学》13号，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第296页。

实际上,金末峰的《亡命女》与丁玲的《霞村》,发表时间有9年之差,但是有着相似的题材和主题思想。金末峰的《亡命女》发表在先,丁玲的《霞村》发表在后,丁玲是否受到金末峰的影响呢?丁玲是从1927年开始发表作品的,那么1932年才发表成名作的金末峰是不是看过丁玲的作品呢?为了核实影响关系,有必要参考一下韩中现代文学相互接受方面的研究资料。韩国是从1920年代初开始接受中国现代文学的,而1934年丁来东在《新家庭》杂志九月号上介绍了丁玲³⁾,1940年9月1日《三千里》杂志上刊登了丁玲作品的译本《他走后》。⁴⁾可以知道丁玲的作品介绍于韩国时间较晚。还有,金末峰在中国的介绍,不能找到有关资料。金末峰和丁玲都没有谈及中国文学及韩国文学,因此她们之间彼此受到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可能性是几乎没有的。不过,由于她们共有类似的时代背景以及韩中文学的巨大的同步性,不谋而合地徐叙写出相似题材和主题思想,真可以说是“巧合”。

那么,金末峰的《亡命女》与丁玲的《霞村》,有着什么样的相似题材和主题思想?《亡命女》主要叙写的对象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由于贫穷做妓女而受到同族男权压迫的殖民地韩国女性,《霞村》主要叙写的对象就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军人强奸后做慰安妇,而后为边区革命组织做情报员却受到大众极大蔑视与侮辱的中国女性。主题思想所显示的她们的出路是抛弃结婚生活投身革命的。不过,更有意义的相似点,就是两篇作品都用相当的笔墨描写两个被蹂躏的女性惨痛的精神伤痕问题。

为了分析这两篇作品的共同点,如果借用后殖民主义思想家斯皮瓦克的“属下”概念来探讨,相信是相当有效的。

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后殖民主义理论中的“属

3) 见〈中国的女流作家〉,《丁来东全集》II,金刚出版社,1971,第155-168页。其实,日帝时期1930年代报刊里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介绍性文章里,对于丁玲多多少少提到过,如卢子泳《中国新文学百花阵》,《三千里》第六卷第七号,1934.6;朴顺天《冰心丁玲的作品》,《三千里》第十三卷第十二号,1941.12,见朴宰雨等编《日帝时期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杂志编》,首尔:Geulsalang,2007。

4) 见朴宰雨等编《日帝时期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作品翻译编》,首尔:Geulsalang,2007,第353-364页。

下”、“属下阶级”是什么意思呢？这与马克思讲的无产阶级有什么不同？属下或者属下阶级（subaltern）一词出自于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文章当中，蕴含着与阶级、性别、种族、语言、文化有关的从属性。由此开始的这个理论，到了斯皮瓦克，相当精致化了。subaltern当中的sub含有‘下位’或‘下部’意思的同时具有substance中的sub那样虽然在我们的视野里看不清楚，但像空气那样能够让我们生存，且珍贵而不能缺少的实体。⁵⁾属下阶级既包括以生产为主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占中心地位的无产阶级，也包括性、种族、文化上属于边缘地位的所有人群。⁶⁾

本论文从属下女性阶级人物所承受的多重压迫，属下女性阶级人物自述及导述，叙事中寻求投身革命出路的途径等方面，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对金末峰的《亡命女》与丁玲的《霞村》进行平行对比考察，进而分析属下女性阶级人物投身革命的叙事问题。

二

金末峰（1901-1962）出生于韩国的庆尚南道密阳市，1918年毕业于首尔贞信女子高中，1920年去日本留学在东京宋荣高中插班。后来又上了高根女塾和京都同志社大学英文专业，毕业以后1927年回国。1929年在中外日报社当了记者，1932年在《中央日报》的新春文艺上发表了成名作《亡命女》。金末峰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由于3·1运动时在黄海道挺身参加了独立运动而被捕囚禁，由于被拷问造成右耳变聋。1930年日帝在韩半岛的殖民统治日益加深，禁止了朝鲜语的使用，朝鲜总督府也废除了中学的朝鲜语课程。有一天，汉奸青年访问金末峰的家，委托她用日语写文章。但金末峰说：“我死也不会用日语写

5) 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著，太惠淑译，《别样世界》，首尔：圖書出版女理研，2003，第541页。

6) 同上，第542页。

文章。”当场就撇折了钢笔，到1945年解放为止整整八年的时间没再写文章。⁷⁾

金末峰的一生中得到最重视的业绩要算是“女性解放运动和废除公娼运动宣言”。1945年光复以后，韩国约有两千名左右的娼妓，其中一半左右在首尔，余下的一半左右在仁川、釜山、大邱等城市。娼妓当中不少患有淋病、梅毒等性病，还有的人在吸毒，因此公娼废除迫在眉睫。但因为涉及到眼前的利益，公娼废除运动遇到了阻力。金末峰说：“公娼一定要废除，20世纪的文明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允许公娼的存在。在解放的祖国，不能堂而皇之地挂出公娼的牌子来，我们从女权主义的角度，反对公娼制度。”⁸⁾金末峰把这种亲身经历写成了长篇小说《华丽的地狱》，这部作品无论是在韩国的民权运动史上还是在女性文学史上，都得到一定的关注，但是考虑金末峰在这个领域里历史上的独特角色，应该得到重新评价。虽然《亡命女》是金末峰公娼废除之前的作品，但作品通过妓女的命运，真实地反映了民族和民众的伤痛和矛盾，从人道主义的视觉对妓女给予了正面的观照，因此公娼废除运动与反映它的作品《华丽的地狱》，可以发现《亡命女》的主题思想的一贯性。

金末峰在30年的创作生涯中共发表了25部长篇小说，1部中篇小说，100多部短篇小说，两首诗，34篇随笔，4篇评论和游记、微型小说等200多部作品。代表作有1930年代的《密林》和《野蔷薇花》，1940年代中期的《华丽的地狱》，1950年代的《蓝翅膀》和《生命》等。

金末峰小说可以概括为两个特点：第一是大众性；第二是宗教性。⁹⁾她自称自己是大众作家，对纯文学表现出了反感。金末峰曾经又说过，如果没有圣经知识，就可能消化不了但丁、托儿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作品。实际上在《亡命女》中也包含着基督教的伦理观。妓女珊瑚珠由于受到抢夺朋友恋人的良心指责，结婚当天毅然放弃心爱的男朋友，决定去奉天参加革命运动。

7) 金Hangmyung, 〈热爱被压抑的女性和民族的民众作家〉, 郑贺恩编, 《金末峰的文学与社会》, 首尔: 鍾路書籍:1986, 第159页。

8) 同上。

9) 金Woogyu, 〈金末峰文学的大众性与宗教性〉, 郑贺恩编, 同上, 第91页。

丁玲(1904-1986)出生于湖南临澧一个没落的封建世家。后来在上海大学文学系就读。1924年在北京认识了胡也频和沈从文,与胡也频坠入爱河。丁玲一生受尽坎坷,在国民党监狱囚禁3年,整风运动时期成了批斗的对象,文革时期被列为右派,在北大荒进行了劳动改造,后又关押到秦城监狱受尽了折磨,1979年才被平反。丁玲1927年开始写作发表了处女作《梦柯》。她的代表作有《莎菲女士的日记》、《韦护》、《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作品。

丁玲的创作道路有人分为三个时期,有人分为五个时期。蔡传佳在《丁玲的创作道路》一文中,将丁玲的创作道路分成为三个时期:一、探索时期(1927-1930),二、发展时期(1931-1942),三、成熟时期(1942-)。文章认为,在“探索时期”,丁玲“关注的对象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命运;着力刻画的是女性倔强的性格,主要描写的是恋爱加革命;表现手法上注重人物的心理剖析。”而在“发展时期”,“丁玲很快跨过《莎菲女士的日记》所描写的范畴,迈出了新的创作步伐。”从题材上看,描写的是工农群众的生活和斗争,从形象上看,刻画的是工农或“工农群相”。在“成熟时期”,丁玲“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深入工农兵生活,写出一批歌颂新人新事的作品”,而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更显示了作家在艺术上的“更趋成熟”。¹⁰⁾

王中忱、尚侠在他们的专著《丁玲生活与文学的道路》中对丁玲的生活与文学的道路做了综合论述,从创作道路上,将丁玲的作品分为早期、左联时期、抗战时期、《桑干河上》时期、新时期等五大阶段。在论述丁玲早期创作时,它认为莎菲是“丁玲早期作品中知识女性形象体系的核心”,早期小说“大体采用两种格式(“客观叙述体”和“心理独白体”);对左联时期的创作,认为优点是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倾向性和“粗犷雄浑的艺术特色”,而缺点则是人物形象不够丰满,生活实感不强;抗战时期的小说,既摒除了左联时期的“概念化倾向”,也“吸取了早期对人物精神矛盾分析的特长”¹¹⁾;本论文认为王中忱、尚侠

10) 袁良骏,《丁玲研究五十年》,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第141-142页。

11) 袁良骏,同上,第142页。

的划分法更具体，更符合实际情况。《霞村》是抗战时期的作品，这部作品中可以看出丁玲欲从左联时期的创作风格中摆脱出来的倾向，而且也能看出莎菲时期人物心理描写的写作特征。

作为韩中女性作家的金末峰和丁玲，她们当然没有忘记自己的民族身份，但是始终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女性身份。她们都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对殖民地女性的蹂躏和摧残。她们都用文学来体现对女性尤其是属下阶级女性的关怀和同情。这两位作家所处的环境有所不同而所享有的表现自由也有所不同，金末峰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环境，由于日帝对朝鲜文学作品出版的严格监视，她未能像丁玲那样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日本人，反而丁玲处于日本侵略下的解放区空间，能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日本人；这两位在本国文学史上的定位也有所不同，金末峰是由于后来得到“大众文学家”的评价而不太受重视，丁玲是由于受到政治批判并坐牢而论争不休的大作家。但是从上面的观点看，她们的作家立场与这两篇作品之间具有相当的相似性与可比性。

三

这第三节里主要探讨两篇作品里属下阶级女性所承受的多重压迫问题。

我们在第一节中提出“属下阶级”这个概念，首先因为这个概念非常适合于解释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在1941年发表的《霞村》和1942年发表的《三八节有感》，因对解放区社会主义女性意识和女性政策方面提出问题为由，丁玲在整风运动期间受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男性”领导们的严厉批评，甚至连她的政治生命上也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因为丁玲从解放区女性的现实处境入手，把解放区知识女性讽刺为“回到家庭的娜拉”，这就等于批判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阵营中也存在阶级与性别的差异。因此无产阶级一词不能够涵盖性、种族、文化上属于边缘地位的人群。刚好，斯皮瓦克的理论虽然属于后殖民主义理论，但是我们发现适用于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与侵略时期的金末峰的《亡命

女》和丁玲的《霞村》两部短篇小说，也是非常恰当的。

1932年发表的金末峰的《亡命女》描述的是日帝时期有关一个叫珊瑚珠的妓女的故事。这篇小说是第一人称叙述，‘我’的原名叫顺爱，爸爸是H礼拜堂的长老也是西方K夫人的语学教师。‘我’经K夫人的介绍，成了C学校的学生。在学校‘我’与一位叫允淑的学长结为姐妹，为了给允淑买礼物‘我’偷了K夫人的十块钱，后来被发现。校长等人用欺骗语言引导了‘我’的自白，结果父亲丢了名誉和工作，‘我’也被学校赶了出来。为了家人的生计，‘我’到处找工作，但因为有了前科，无人雇用‘我’，后来不得不去明月馆当妓女。¹²⁾有一天，‘我’因身体不舒服想早早休息，不打算接客，但由于老鸨的左哄右劝，勉强起来陪酒时与一位男嫖客发生了争执。‘我’受到了种种的侮辱和挨打，后被朋友允淑花巨额赎身费从明月馆救出来。允淑把‘我’安顿在自家，劝‘我’忘记过去一切从头开始。但‘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不改恶习依旧抽烟、吸毒。‘我’中断了与允淑去教会礼拜，还逐渐渴望着虽苦涩但甜美的欢场之夜。正当允淑逐渐对我失望时，出现了一次转机。刚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允淑的男朋友尹昌燮深深地吸引了‘我’，他谈起的反动分子、苏维埃、五年计划、男女平等字眼让‘我’感到了好奇。尹常常给我带来杂志和书籍，有时还让我油印文件。慢慢地‘我’与尹产生了恋情，终于决定择日与尹举行婚礼。结婚当日，‘我’因受到良心的谴责，放弃结婚，坐上了开往奉天的火车，去执行革命任务。

‘我’受着来自白人女性¹³⁾、殖民地男性、殖民地女性的肉体/精神、性、经济等方面的多重压迫。被沦落为妓女的‘我’，身体变成了抚养家人的场所。女性的身体在交换为商品的过程中已成为物化。物化的‘性’在交换为货币的前提是包括健康的身体、笑声、歌声等都要满足作为购买者的男性。请看引文：

12) 因在教会里偷了一点点钱，而最后沦落为妓女的故事，多少让人感觉不够切实。这部作品是金末峰的处女作，也许是她创作手法上的不够成熟，也许是当时受到普罗文学影响的思想局限性。

13) 金末峰设定统治阶级人物时，不引进“日本人”而设定“白人女性”，或可以解释：由于在日帝监视殖民地韩国人出版的语境下，有不得意这样做的一面。实在，她的作品里很难找到给日本人赋予坏蛋角色的。或可以解释：这篇作品的针对性就是基督教徒里面所见的某些虚伪意识。

“您好！我叫珊瑚珠。”穿西装的客人笑嘻嘻地说：“看来性格很爽朗，脸蛋儿也怪俊的。珊瑚珠给我倒杯酒。”

我强忍着身体的不便和要打出来的哈欠倒酒。坐在对面的叫吴主事的家伙醉意熏熏地说：

“喂，珊瑚珠唱支歌吧。我什么歌都喜欢，来，唱一首。”

(中略)“我说你没听见啊，你瞧不起我吗？你敢放肆！”

(中略)“对不起，今晚我身体不舒服。”

“你想蒙我呀！我花钱叫你，你以为我钱没地方花了？到这儿来本来是来为了高高兴兴地玩儿，是图个让全席人快活。”¹⁴⁾

性别化的属下阶级女性身体不断地被剥削。谁想到过商品化的属下阶级女性身体也像机器一样不断地在折旧？8年前还纯洁如玉的珊瑚珠身体，到了明月馆以后，被剥夺了自由，健康糟蹋了，身体感染了各种各样的性病。老鸨软硬兼施，从珊瑚珠的身上不断地榨取高额的利润，但作为属下阶级女性的珊瑚珠只能忍气吞声。

如果说金末峰把属下阶级女性所承受的压迫集中在与白人女性、殖民地男性/女性的矛盾上，那么丁玲把女性属下阶级所承受的压迫集中在与帝国主义男性、解放区女性/男性之间的矛盾上。在解放区搞创作的丁玲较之于日帝监视下的金末峰写作环境相对自由，因此丁玲在作品中较为深入地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男性对中国女性的压迫和罪行。

丁玲的《霞村》讲述的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一位叫贞贞的慰安妇¹⁵⁾的故事。贞贞有相爱的小学同学叫夏大宝，可是他家很穷，家里反对与他成婚，强迫贞贞做一家米铺小老板的填房。一气之下贞贞要去当姑姑，不幸被日军掳去，饱受摧残被迫当了慰安妇。后又接受边区党的任务，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

14) 金末峰,〈亡命女〉,徐Jungja编,《韩国女性小说选I》,首尔:甲寅出版社,1991,第80页。

15) 董炳月,《贞贞是个慰安妇-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解析》中说:“在笔者的阅读范围内,将贞贞称作(看作)“慰安妇”的仅有日本学者中岛碧一人。”笔者也同意中岛碧先生的观点。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二期,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作家出版社,第211-212页。

为游击队获取情报。身染性病的贞贞回到故乡时，村里人就像是见到怪物一样，对她给予了谩骂和凌辱。作为解放区知识分子的‘我’对村里人这种态度感到不满，就像朋友一样向贞贞伸出了温暖的双手并主动与贞贞聊天。虽夏大宝对贞贞的爱依旧如故，但贞贞终于做出痛苦的选择，拒绝结婚而去了延安。

这部作品是丁玲根据当地做妇联工作的女同志告诉她的一个被日军强奸以后在延安医院接受治疗的女工作员的实际经验编写出来的。丁玲说：“这种人，这样的事，在当时抗日前方的村子里是不少见的。”¹⁶⁾《霞村》描写了失去贞操的女性不仅要忍受肉体上痛苦还要忍受的精神上痛苦的惨痛现实。孟悦和戴锦华将谩骂贞贞的村里人为：“一个有几千年封建小农意识汇聚的无意识杀人团。”¹⁷⁾斯皮瓦克在《在别样世界》中反问：“殖民地女性深受着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男性以及殖民地统治阶级女性的多重压迫，在此种情况下属下阶级女性能为自己代言吗？”¹⁸⁾村里人猜测与贞贞睡觉的男人至少也得有一百多人。但实际数目比一百要多得多。¹⁹⁾只有十八岁的贞贞却患着严重的性病，这说明贞贞被日军遭到了肉体上、精神上的残酷蹂躏。但更使贞贞痛苦的是村里人的异样目光与责难，以及家人和亲戚的不理解。看下面几条引文：

“她那侄女儿你看见了么？听说病得连鼻子也没有了，那是给鬼子糟蹋的呀。”他又转过脸去朝站在里边门口的他的老婆说：“亏她有脸面回来，真是他爹刘福生的报应。”²⁰⁾

“听说起码一百个男人总‘睡’过，哼，还做了日本官太太，这种缺德的婆娘，是不该让她回来。”²¹⁾

16) 王增如，李向东编著《丁玲年谱长编(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第158页。

17)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第134页。

18) 金尚律，〈脱殖民主义理论〉，金成坤编，《21世纪文艺理论》，首尔：文化思想，2005，85-86页。

19) 据韩国慰安妇金福东（音译）讲，她们平日每天要接待的日军是十五人左右，周末就更多，可能超过五十多人。梁美康，〈治愈历史性创伤后心理压抑症—看日军‘慰安妇’问题的新视觉〉，《基督教思想》，2009年8月号，首尔：大韩基督教教会，第52页。

20) 《丁玲文集》第三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第226页。

21) 同上，第226页。

“还找过陆神父，一定要做姑姑，陆神父问她理由，她不说，只哭，知道那里边闹的什么把戏，现在呢，弄得比破鞋还不如……”²²⁾

“这次一路回来，好些人都奇怪地望着我。就说这村子的人吧，都把我当个外路人，有亲热我的，也有逃避我的。再说家里几个人吧，还不都一样，谁都偷偷地瞧我。没有人把我当原来的贞贞看了。我变了么，想来想去，我一点也没有变，再说，也就心变硬一点罢了。人在那种地方住过，不硬一点心肠还行么，也是没有办法，逼得那么做的哪！”²³⁾

在日军军营里饱受痛苦和折磨的贞贞想从家人和故乡人那里得到安慰和治疗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可是侵染儒家思想几千年的男权主义社会里，对没有坚守贞操的集体责难，就像暴力一样向十八岁的小姑娘袭来，这对于任何人都是难以承受的。我们从韩国慰安妇文毕基 (音译) 老人的陈述中就能知道贞贞所受到的心理痛苦并非夸张。她说：“去市场或村里的时候，只要是五六个人聚在一起开玩笑、聊天，我总觉得她们在取笑我。所以人多的地方我不敢去。”²⁴⁾这说明慰安妇的伤痛多么重，多么深刻。‘慰安妇’的经验是说不出口的耻辱记忆，只有沉默才是少受伤害的较有效的办法。可是贞贞却有所不同，她把在日军军营里的事情都说了出来。“她说起鬼子来就像说到家常便饭似的，才十八岁呢，已经一点儿也不害羞了。”可见，对贞贞的流言蜚语并非无中生有。贞贞为什么要说出来？她能为自己代言吗？

汉娜·阿伦特曾经提到过“所有的悲伤”得到“编成故事说出来”，才能“挺下去”的说法。²⁵⁾未被治愈等待解决的暴力性压力心理障碍症，首先变成语言被大众分有²⁶⁾的时候才可以得到治愈。未曾分享的记忆等于没有发生一样，这就是

22) 同上，第227页。

23) 同上，第232页。

24) 梁美康，〈治愈历史性创伤后心理压抑症—看日军‘慰安妇’问题的新视觉〉，《基督教思想》，2009年8月号，首尔：大韩基督教教会，第54页。

25) 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 著，竺乾威译，《人的条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6) 分有 (partage) 一词是由日本历史学者Oka Mari(岡真理)提出来的。意思是分享他者的经验。岡真理著，金炳丘译，《记忆，叙事》，首尔：昭明出版，2000，第34页。

忘却的暴力性。²⁷⁾贞贞的言行是不是就是把自己遭受到的不幸说出来，想与大众分有，从而减轻痛苦的无意识的流露呢？类似这样的言行在珊瑚珠身上也可以找得到。珊瑚珠与吴主事打架的时候，她一边骂一边打吴主事耳光。结果不但没打上吴主事，自己反而挨打了两三个耳光。周围的朋友说珊瑚珠今天疯了，认为她不正常。但珊瑚珠瞬间感到了浑身的痛快，恨不得自己马上疯了以后，忘记痛苦，说出憋在内心的所有怨愤。作为属下阶级女性的贞贞和珊瑚珠，她们通过“说出来”这种本能的行动，来达到治愈伤痛的目的。但是周围人不但不同情她们，反而施加责骂和暴力。即使是朋友也把她们当作歇斯底里患者。所以属下阶级女性不能为自己代言。但是有了知识分子的介入，情况就不一样了。知识分子作为文学的叙述者，可以用各种方式把属下阶级女性的话“说出来”。

四

这第四节里主要谈两篇作品里属下阶级女性的自述与导述问题。

金末峰的《亡命女》与丁玲的《霞村》中都有知识女性的登场。《亡命女》中允淑既是‘我’的同学，又是交友。她不但把‘我’从明月馆里救了出来，而且为了让‘我’重新做人，给予了很多物质上、精神上的帮助。《霞村》中‘我’既是解放区的干部，又是作家。‘我’为了不刺激贞贞的伤痛，只是无言地递上了一杯热茶。于是贞贞主动与‘我’搭话要想与‘我’学习。斯皮瓦克主张殖民地女性的主体性本质上已被封锁了，所以提出了那有名的一句话：“属下阶级能为自己代言吗？”性、阶级、种族等多重压抑下的属下阶级女性，不管她们怎么想，她们既缺乏表达语言的能力，即使说出来，也不会被接纳，也进不了主要论坛的阵容。²⁸⁾即使是这样，斯皮瓦克大声疾呼，为了重建殖民地女性的主体性，应带

27) 金Miyoung, 〈关于日军慰安妇问题的历史纪录和文学再现的叙事方式比较考察〉,《韩国语言》45, 庆山:韩国语言学会, 233页。

有战略性地、本质性地说出来。²⁹⁾因此，斯皮瓦克呼吁知识分子站在属下阶级一边引导她们说出话的重要性。斯皮瓦克在《后殖民理性批判》中主张，知识分子首先要解构西方的理论，通过土著民收集资料，掌握第三世界的特殊性以后，再试图向属下阶级递话。只有这样，才能引导她们说出话来。³⁰⁾

用斯皮瓦克的理论分析上述两部作品，就更有说服力。允淑之所以救援‘我’，是因为她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允淑救援‘我’时是这样说的：“主的意愿是不在于九十九只羊上，而在于丢失的那一只羊上。现在也不晚，我们就去等待你的主面前……”然后又说，要彻底忘记过去，没想到你会这么堕落等等。但允淑没能把知识分子的权威放下来，不知道‘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其实‘我’最痛恨的是把自己跌入陷阱的一些基督教徒的虚伪性。结果‘我’更加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虽然允淑救援了‘我’的肉体，但没能救援‘我’的灵魂。真正救援‘我’灵魂的人是允淑的男朋友尹昌燮。他不仅给‘我’讲解男女平等等新真理，而且给我拿一些书籍和杂志，使‘我’对人生重新报有了希望，憧憬社会运动。请看以下引文：

“顺爱，为人类解放事业，你能成为我的同志吗？”

(中略)“请你接受连允淑也不能够理解的同志之爱。不是说一起战斗而死的战友比恋人更加亲密吗？”³¹⁾

(中略)“只有经历过生与死磨难的你，才有资格走在第一线。……你的体验是用金钱买不到的。好，请答应我，成为我的同志……”³²⁾

“我”能够成为革命战士，既不是牧师的传教，也不是允淑的祈祷，而是尹昌燮的同志之爱。

28) 金尚律,〈脱殖民主义理论〉, 金圣坤编,《21世纪文艺理论》, 首尔:文化思想, 2005, 第85-86页。

29) 斯皮瓦克著, 太惠淑译,《别样世界》, 首尔:圖書出版女理研, 2003, 第544页。

30) 金尚律,《脱殖民主义理论》, 同注28, 第86页。

31) 金末峰,〈亡命女〉, 徐Jungja编,《韩国女性小说选 I》, 首尔:甲寅出版社, 1991, 91页。

32) 同上, 92页

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趋势来看，“五·四”时期重新发现“人”，就提倡“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其目标是个性解放、人的解放、平民的解放。“平民”主要指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到“左联”时期又推行过文艺大众化运动，这“大众”就比较具体了，指的是广大的普通民众，特别是下层民众，但关注点往往局限于语言和表现形式的通俗化。抗战时期文学，尤其是解放区文学，读者扩大为广大的普通民众（主要是农民），作家也有条件真正到群众中去，熟悉和了解普通群众的生活。³³⁾作家也开始学习群众语言，用群众所理解的语言搞创作。《霞村》是丁玲在解放区写的作品，描写了失去贞操的女性痛苦，批判了解放区农民的封建贞操意识。‘我’听到村里人对贞贞的流言蜚语以后，从侧面收集一些对贞贞的大致情况，然后怀着无限的同情，舍弃偏见，默默地倾听贞贞的叙述或者用聊天的形式引导了贞贞的叙述。这时，贞贞的叙述不再是无意识的倾述。“她一点有病的样子也没有，她的脸色红润，声音清晰，不显得拘束，也不觉得粗野。她并不含一点夸张，也使人感觉不到她有什么牢骚，……”³⁴⁾这说明，贞贞是在冷静的心态下述说自己的痛苦的，因为‘我’是知识分子，贞贞相信知识分子能为自己代言。

《亡命女》中的‘我’能够从多重的肉体、精神的压迫中解脱出来。‘我’被基督教的人道主义得到了肉体的救援，被男性知识分子得到了精神上的救援。其理由是‘我’接受了异性的爱。《霞村》中的贞贞，无论是在肉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没有得到救援。贞贞虽然为了治病暂时离开了日军军营，但贞贞是受到边区革命政权的指示在日军部队做情报员的，因此再次进入日军军营当慰安妇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这就是革命的残忍性和暴力性的一面。不过，跟丁玲所说的一样“这种人，这样的事，在当时抗日前方的村子里是不少见的。”³⁵⁾其实，贞贞的身体在抗日战争的名目下，被一些人所利用。虽然贞贞看到日军战败，抗日军取得胜利时得到了精神上的慰藉、心情也感到轻松。但谁认可了贞贞是

33)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354页。

34) 《丁玲文集》第三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233页。

35) 王增如，李向东编著《丁玲年谱长编(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第158页。

革命战士？《霞村》发表以后，人们骂贞贞是民族的败类，连丁玲也受到了解放区领导的批评。贞贞在故乡亲戚和邻居的指责和谩骂中，连爱情这样最基本的欲望也不得不拒绝。这说明，贞贞没有从精神痛苦中得到了救援。在当时的现实中，像慰安妇这样的属下阶级女性，即使是借助于知识分子的语言，也很难进入话语的中心圈。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女性解放事业的任重道远。³⁶⁾

五

我们在这第五节里，探讨两篇作品对寻求女性解放出路问题，如何进行叙事。

现代以来，‘女性解放’是韩中现当代文学的主要主题之一。女性解放运动是女性作为独立的人，取得权利和自由的过程。注重贞操的儒家意识形态社会体制下，传统道德观和贞操观是女性解放的最大障碍。周建人主张：“为了女性解放，女性必须在经济和性上得到解放。”为了女性性的解放，比实践更为重要的是观念的改变。尤其是女性自身观念的改变更为重要。韩中女性作家金末峰和丁玲是怎样把女性解放再现为文学的？其文学再现中有什么共同点和不同点？过去是妓女或慰安妇的属下阶级女性顺爱和贞贞是怎样看待自己的？对自己的未来又是怎样想的？请看下面引文：

终于到了结婚的日子。东窗发白，我还是沉浸在万般的思绪中，几乎整晚没能合眼。我这种像尸体一样肮脏、可怜的身体，能配做既高贵又优雅的尹老师新娘吗？难道我不是在做梦吧？我发誓把过去的我永远地埋葬起来，从此成为真正的生活勇士。³⁷⁾

36) 1949年中国解放后，慰安妇或者娼妓们，彻底改造，得到根本解决。参见杨洁曾、贺宛男，《上海娼女改造史话》，上海三联书店，1988。不过，1980年代采取市场经济之后，娼妓问题慢慢有复生之势，已经蔓延全中国主要城市里。如果她们也算是属下阶级女性，那么，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来为她们述说？从这样的观点看，当下中国各种属下阶级女性的问题，也可以试图利用斯皮瓦克理论来加以解释。

“恨他。我也说不上。我觉得我已经是一个有病的人了，我的确被很多鬼子糟蹋过，到底是多少，我也记不清了，总之，是一个不干净的人了。既然已经有了缺憾，就不想再有福气，（中略）到了延安，还另有一番新的气象。我还可以重新做一个人，人也不一定就只是爹娘的，或自己的。”³⁸⁾

上述引文的共同点就是失去贞操的女性，都认为自己不干净。这说明属下阶级女性本身也没能从男权主义贞操论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干净的人究竟是什么？人一般可以分为肉体和精神。以往人们强调的是肉体的纯洁，无论女性心灵多么龌龊，只要没有失身，认为她就是纯洁的。因此，有多少女性为守住贞操，宁愿放弃宝贵的生命。所以，所谓女权主义者一直指责：为什么糟蹋女性贞操的男性逍遥法外，而却由女性来承受这一切责任？顺爱和贞贞，比谁都深爱着自己的恋人，她们的爱是纯洁的。她们舍身为抗日运动投奔，她们有权利去爱，她们的人权应该得到保护。如果没有这样的前提，女性解放就无从谈起。顺爱能够接受异性的爱，而贞贞却像中性人一样，毅然拒绝初恋，迷信失身的女人不会幸福的宿命论。金末峰和丁玲实现女性解放的突破口是让属下阶级女性找到新路，走向革命。金末峰对女性解放的文学再现方式可以从韩国现代文学的脉络中寻找其答案。韩国现代女性作家跟家庭和社的压迫作抵抗，寻求了女性解放的出路。第一种出路的代表作家是罗惠锡和金明顺。她们受到自由主义女性解放思想的影响，否定男权主义的制度和习俗，重视异性之间的爱情，通过改革男权主义制度，来寻求女性解放。第二种出路是的代表是姜敬爱和朴花城。她们受到社会主义女性解放思想的影响，重视同志之间的爱，通过阶级的解放来实现女性的解放。³⁹⁾从《亡命女》中的顺爱通过男友尹昌燮的爱情得到精神上的救援这个角度看，金末峰好像受到自由主义女性解放思想

37) 金末峰,〈亡命女〉,徐Jungja编,《韩国女性小说选I》,首尔:甲寅出版社,1991,94页。

38) 《丁玲文集》第三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第241页

39) 朴钟弘,〈新女性的‘两价性’和‘离家出走’考察〉,《韩民族语文学》第48辑,首尔:韩民族语文学会,第309页

影响，但是从“作为您的同志，帮助您的日子将不会太遥远。（中略）您的小同志S·A”这些话和顺爱拒绝和尹昌燮的结婚而投身革命的最后情节中我们可以知道，金末峰显然受到了社会主义女性解放思想的影响。丁玲的情况有所复杂。第一，1933年丁玲被国民党囚禁三年，逃出来以后，在党内一直受到叛变的嫌疑。因此，丁玲有必要通过作品，表达自己坚定的革命斗志，以证明自身的清白。第二，丁玲1927年发表《韦护》以后，欲从革命加恋爱模式中摆脱出来，而且通过瞿秋白和王剑虹的爱情悲剧中，对男性的爱情功利性态度持有怀疑。开始确立了在男权主义社会下，女性应具有独立自主的精神。因此，丁玲对《霞村》里贞贞的救援，不是通过爱情的救援，而是通过革命来寻求女性的解放。从结果处理的角度看，这两篇作品的出路提示是非常类似的。

六

以上通过平行对比的方式分析了金末峰的短篇小说《亡命女》和丁玲的短篇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日帝统治下的韩国女性，命中注定地受到作为殖民者及作为女性的双重压迫。由于日帝的压抑和监视，金末峰虽然不能把笔头指向日帝殖民统治阶级，不过，在她的笔锋下，作为妓女的顺爱，不仅要受到老板娘的剥削，也要受到殖民地男性对肉体 and 精神的蹂躏和侮辱。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女性也要受到双重的压迫。丁玲笔下，当过慰安妇的贞贞，被日本帝国主义男性受到了肉体的、精神的压迫，回到故乡以后还要受到村里人的指责和谩骂。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论认为，女性被支配的原因在于‘随着生产力发展，发现了剩余价值’即原因在于私有财产的问题上。因此，跟男性一样，女性的真正解放在于推翻资本主义和废除私有财产。⁴⁰⁾但是丁玲却批判，解放区内依然实现不了真正的女性解放。因此，本论文利用斯皮瓦克的属下阶级理论，比较考察了日本殖民地时期韩中属下阶级女性解放的出路。多重压迫下的属下

40) 罗伯特·海密顿，崔民之译，《女性解放论争》，首尔：Pulbit，1982，第15-18页

阶级能为自己代言吗？为了让属下阶级女性自述，知识分子应怎样介入和进行导述？金末峰不是用基督教的说教形式，而是通过男性知识分子的介入，利用男女平等、同志爱等社会主义女性解放思想，引导属下阶级女性自述，属下阶级女性通过加入革命的形式提高其身份，来寻求女性解放。丁玲通过女性知识分子与属下阶级女性的平等对话，引导属下阶级女性自述。金末峰和丁玲都把女性解放的出路寄托在身份的改变上，既以加入革命的方式，寻求女性解放。金末峰小说中的顺爱得到了肉体和精神上的救援，其根据是通过女朋友允淑花高额赎身费从妓院中赎了出来，实现了肉体的救援，通过允淑的男朋友她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顺爱又回到了正常的生活轨道中，与男性坠入爱河，说明她的精神也得到了救援。而丁玲小说中的贞贞以慰安妇的身份，为边区革命政府收集情报。贞贞的肉体依旧没有得到救援。贞贞是18岁的青春少女，她有恋爱成家的自由和权利。但在故乡亲友们的语言暴力面前，她毅然放弃爱情走向革命之路。这说明贞贞无论是在肉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没有得到救援。《霞村》发表以后，丁玲受到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批判，说贞贞是民族的败类。这不能不说是了解放区女性主义的一种反讽。

参考文献

- 《丁玲文集》第一卷,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 《丁玲文集》第三卷,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 王增如、李向东编著《丁玲年谱长编(上)》,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6,
- 王瑶编著, 《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 北京: 开明书店, 1951
- 袁良骏, 《丁玲研究五十年》, 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 1990
-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 刘剑梅, 《革命与情爱》,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9
- 杨洁曾、贺宛男, 《上海娼女改造史话》,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88
-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著, 竺乾威译, 《人的条件》,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 孟悦、戴锦华, 《浮出历史地表》,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 丁来东, 《丁来东全集》II, 首尔: 金刚出版社, 1971
- 徐Jungja编, 《韩国女性小说选I》, 首尔: 甲寅出版社, 1991,
- 郑贺恩编, 《金末峰的文学与社会》, 首尔: 鍾路書籍:1986,
- 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著, 太惠淑译, 《别样世界》, 首尔: 图书出版女理研, 2003
- 金圣坤编, 《21世纪文艺理论》, 首尔: 文化思想, 2005
- 金允植、金宇钟等著, 《韩国现代文学史》, 首尔: 现代文学, 2004
- 罗伯特·海密顿, 崔民之译, 《女性解放论争》, 首尔: Pulbit, 1982
- 朴宰雨等编《日帝时期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杂志编, 新闻编, 作品翻译编, 首尔: Geulsalang, 2007
- 金相姝等合译, 《中国现代女性作家选集》, 光州: 全南大学校出版部, 2003
- 周靖波, 〈论延安时期丁玲的创作及转变〉, 《中国现代文学》13号, 首尔: 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
- 袁洪权, 〈革命者与女性的深层焦虑〉,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 2008, 第3期
- 董炳月, 〈贞贞是个‘尉安妇’〉, 《中国现代文学丛刊》, 2005, 第二期, 北京:

中国现代文学馆

权Mira, 《金末峰通俗小说研究》, 大邱: 岭南大学校教育大学院硕士论文, 2006

洪Eunhee, 《金末峰小说研究》, 富川: 加图立大学校硕士论文, 2002

金Hyesun, 《丁玲作品所表现的女性像分析》, 京畿大学校教育大学院硕士论文, 2004

卢升淑, 〈丁玲的女性小说与女性话语〉, 《中国文化研究》第五集, 首尔: 中国文化研究学会

梁美康, 〈治愈历史性创伤后心理压抑症〉, 《基督教思想》, 2009年8月号, 首尔: 大韩基督教书会

朴钟弘, 〈新女性的‘两价性’和‘离家出走’考察〉, 《韩民族语文学》第48辑, 首尔: 韩民族语文学会

金Miyoung, 〈关于日军慰安妇问题的历史纪录和文学再现的叙事方式比较考察〉, 《韩国语言》45, 庆山: 韩国语言学会

〈Abstract〉

Two Descriptions of women subaltern's participation in revolution

Kim, Yeong-myeong / Park, Jae-woo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woman in exile”, the short novel by Kim mal-bong and “when i was in XIACUN” by Ding-ling using parallel comparison method. Korean women under the rule of Japan had to suffer the double subordination as women as well as colonists. This article tried to compare the release outlet of the Korean-chinese women who were in the subordinate position through the subaltern theory of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Kim mal-bong tried to bring the matter of women's subordinate position through the idea of women's liberation like sexual equality and congenial spirits with the appearance of a male intellectual, not through the Christian preaching. Ding-ling developed the story through the equal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female intellectuals and female subordinates.

Key Words : subaltern, feminism, Kim mal-bong, Ding ling, a revolution

투 고 일 : 2010. 9. 10. / 심 사 일 : 2010. 9. 20. ~ 2010. 10. 10. / 게재확정일 : 2010. 10. 15.